

陈嘉庚的海洋观及其实践探索

王燕琴¹, 董立功²

(1.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2. 集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在海洋地位日益重要、海洋争端日趋复杂的今天, 从前人关于海洋的思考和实践探索中汲取智慧, 有助于我们今天海洋强国战略的推进。陈嘉庚在其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利用海洋的实践基础上, 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海洋观。陈嘉庚的海洋观包括: 捍卫海权, 维护海洋安全; 发展海运, 大力拓展海利; 兴办水产、航海教育, 培养海洋人才; 关注海洋资源, 发展海洋科学。陈嘉庚大力呼吁认识和利用海洋, 并亲身参与实践探索, 为祖国的海洋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其海洋观对我们今天建设海洋强国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陈嘉庚; 海洋; 海洋观; 海洋强国

[中图分类号] D 6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4) 05-0019-08

一、引言

海洋观是人们对海洋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 and 价值的理性认识, 是人们对海洋与国家、民族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总体看法^[1]。中国既是陆地大国, 又是海洋大国, 具有悠久的海洋开发利用史。人们在开发和利用海洋的过程中会对海洋的地位、作用、价值等进行思考和判断, 从而形成各式各样的海洋观。当今世界, 海洋地位日益重要, 海洋争端日趋复杂, 在国家大力建设海洋强国的背景下, 如何从前人关于海洋的思考、论述、实践中汲取有益经验, 成为摆在当代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与海洋有着不解之缘。他出生、成长于海边, 成年后, 他的商业版图和教育事业均涉及海洋事业。陈嘉庚高度重视海洋事业, 他曾说: “海洋事业为世重视, 各国无不皆然。其技术之重要, 前途之远大, 生活之安定, 为各业冠。”^{[2]257} 他一生发表过众多与海洋相关的言论, 并积极投身于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利用海洋的实践之中,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海洋观。

关于陈嘉庚的海洋观, 目前虽有学者涉略, 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不多。如, 洪卜仁在《厦

门航运百年》中部分篇幅涉及陈嘉庚创办航海教育的过程, 侧重于陈嘉庚的航海教育观^[3]; 袁东星等在《启航问海——厦门大学早期的海洋学科 (1921—1952)》一书的引言中谈及“陈嘉庚先生的海洋情结”, 但全书的着重点在于阐述厦门大学海洋学科的发展史, 对陈嘉庚的海洋观着墨较少^[4]; 宋丽丽所著《陈嘉庚海权意识及其教育实践》一书论及陈嘉庚的海权意识与水产航海教育的相互关系以及陈嘉庚兴办水产航海教育的历史地位与社会影响^[5]。笔者在中国知网检索发现, 与陈嘉庚海洋观直接相关的论文仅有4篇。其中, 陈国彪等的《以软实力视角看福建海洋文化——以陈嘉庚为例》一文以陈嘉庚为例, 重点探讨福建海洋文化的特性及作用^[6]; 彭化义等的《大海永远铭记——追寻著名华侨陈嘉庚的海洋报国路》发表于1990年, 成文较早, 偏重于史料和文学角度^[7]; 田圆的《兴学育才 逐梦深蓝——陈嘉庚创办航海教育培养海洋人才侧记》主要着眼于讲述陈嘉庚兴办航海教育的初衷、特色及贡献^[8]; 直接以陈嘉庚海洋观为题并作为论述重点的是薛晗等人撰写的《从〈我国行的问题〉探析陈嘉庚海洋观》, 从海洋资源观、教育观、战略观、产业观、文化观、国土观等方面论述陈嘉庚的海洋观^[9], 对研究陈嘉庚的海洋观具有借鉴意义, 但其文献来

源仅仅局限于陈嘉庚的《我国行的问题》一书,而体现陈嘉庚海洋观的文献广泛地分布在他的书信、演讲词、文章等文献资料之中。综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陈嘉庚的海洋观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二、陈嘉庚的海洋观及其实践

陈嘉庚的海洋观目前并未形成固定的提法,但可以从陈嘉庚对海洋事业的思考、言论及实践探索中窥见一二。

(一) 捍卫海权, 维护海洋安全

海权是一个国家对海洋的实际管辖能力、控制能力和防御自卫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海洋安全。“海权”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传到日本,译作“海上权力”,简称“海权”,于清末传入中国。在梁启勋等人的论述以及近代中国关于海洋问题的实务中,“海权”概念在中国得以确立^[10]。

中国近代海权沦丧,有海无防。列强屡次以海洋为通道入侵中国,从海上打开中国的国门。陈嘉庚生于清末,那时的中国正处在“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迫于眉睫”^[11]之际。他的家乡厦门作为中国沿海重要港口,自然成为侵略者攻击的目标。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舰先后3次入侵厦门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厦门被迫开放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殖民势力纷纷进入厦门。厦门成为近代中国海洋门户洞开、海洋权益丧失殆尽局面的一个缩影。1878年12月10日,英国侵略者强租厦门一片海滩,泉州厦防分府告示工人,不准在附近行动^[12]。1900年1月25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厦门日本专管租借续约章程十二款》,划定厦门虎头山下临海滩地约4万坪为日租界^[13]。1902年,厦门鼓浪屿被列强正式划为公共租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以海军封锁我国各海口,使我国军火等物资来源断绝。“我国积弱,海陆空军均落后,而尤以海军为甚,致沿海交通完全丧失”^[14]^[164]。日军在侵占厦门7年多的时间里,犯下了滔天罪行,闽省沿海渔民被杀、被炸伤者众。陈嘉庚在《南洋商报》发表的文章中曾这

样描写日寇在闽南的暴行:“暴寇捕我渔民,先用汽油浇身,放火焚杀,然后破沉其舟,任其漂流海上,待其焦皮烂肉不生不死之际,复用机关枪扫射”^[15]。海权的沦丧、民生的疾苦,让陈嘉庚深感捍卫海权、维护海洋安全的重要性。

海权的沦丧既关系到国家和国民的安全,也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陈嘉庚痛心于近代中国的内河、近海和远洋航运被帝国主义垄断,他曾这样写道:“船舶川行如织,但航权均操洋人掌握。我国公私营船舶即在国境,犹廖若晨星,况在海外各属殖民地,何从觅其踪影。”^[2]^[256]对于海权沦丧、海运不畅所造成的现实和潜在风险,陈嘉庚明确指出,一旦有战事发生,如果我国的海口被敌人封禁,内地必然粮食短缺,到时不用等敌人施以炮弹武器,我们自己已经先纷乱饿死了。他认为这种现象如果没有得到改观,国家将处于被动挨打的危险境地。因此,他热切期盼国家能挽回海权,说:“若能挽回利权,扩而充之,不特沿海各省,可以自给自足,尚可发展无限资源,助益内地各省事业,为富国强兵奠立一伟大基础。”^[15]挽回海权既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也是实现富国强兵的基础。

陈嘉庚不仅时常呼吁要“挽回海权”,更是把这一理念落实到实际行动中。1920年,他在家乡集美兴办水产航海教育就是为了“内利民生,外振国权”^[16]^[341]。1923年,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就成立了“海童子军”,这在全国是最早成立的,也是仅有的“海童子军”^[16]^[359]。创办“海童子军”的目的,就是为中国海军提供后备力量,以保卫海权、报效祖国。在校主陈嘉庚的影响下,集美学校的师生也纷纷加入捍卫主权、捍卫海权的斗争中。1928年4月,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学校成立“反抗日本侵略国权分会”^[3]^[175],广大师生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频频派军舰侵犯中国领海,陈嘉庚对此忧心忡忡。1937年9月3日,中国守军在厦门海域击沉日军一艘驱逐舰,陈嘉庚立即发贺电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海军建设刚刚起步,部分西方国家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骚扰。陈嘉庚得知后,积极进行交涉。1950年3月4日,他在怡和轩俱乐部接见美国华盛顿州世界事务协会主席汤姆生,在谈话中,对这个顽固分子

的许多荒谬论点进行驳斥,并质问美国用飞机帮助蒋介石残杀中国人民、封锁中国海岸^[17]。

(二) 发展海运,大力拓展海利

除了号召并投身于“挽回海权”的活动,陈嘉庚还倡导要发展海运,大力拓展海利。陈嘉庚16岁时下南洋谋生,几十年商海沉浮开阔了他的眼界,让他敏锐而深刻地感受到海洋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他曾指出:“自有轮船以来百余年,世界交通,日臻发达,富强隆盛,多属沿海国度。”^{[2]256}沿海国度容易富强隆盛,正是缘于海洋所提供的便利的交通条件。海运是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具有运量大、价格低廉等特点。对于发展海运,陈嘉庚大力提倡。

我国海岸线漫长,为海运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先天条件,但近代我国海运的发展状况却与良好的自然条件极不相称。近代我国的海运业长期被外国垄断,这让陈嘉庚清晰地意识到海权的丧失、海运的落后,势必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影响到国计民生。他说:“自中外交通以来,政治腐败,主权丧失,舶来品日来侵蚀,不但衣食住之物品源源输入,而‘行’所需要之舟车,竟完全倚靠外来物,或操于外人之手。虽有极少数人稍获利益,而国计民生受漏卮之害,日甚一日,惨重莫可言喻。”^{[2]129}为此,他大声疾呼:“我国如不设法补救,数年之后,每年金融之大漏卮,虽海外千余万华侨血汗外汇之金钱,不能抵塞半数,便是全国任何一种大宗出口物,如茶丝豆亦不敷其垫补。”^{[2]129}如果国家不大力发展海运、不重视海洋带来的经济价值,将给国家的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

关于海运的重要性,陈嘉庚在经商过程中有切身的体会。在南洋经商时,陈嘉庚的米厂需要从安南(越南)和暹罗(泰国)采购稻谷,他的产品包括熟米、菠萝罐头、橡胶制品等也需要通过商船运到世界各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由于海路梗阻、军运为先,他几个厂子所生产的罐头和熟米都运不出去,被迫停止生产。那段时间他深刻感受到“银根困苦不可言喻”“艰难维持,度日如年”^[18]。可以说,海运是他兴办和维持实业的生命线。陈嘉庚敏锐地看到海运大有可为,他果断涉足航运业。1915年他租入“万通”轮、“万达”轮等4艘轮船,一年间获

利20余万元;后又购入“东丰”轮和“谦泰”轮,运输货物,亦获利可观。陈嘉庚的轮船航运业,鼎盛时期远及五洲四洋。遗憾的是,1918年“东丰”轮和“谦泰”轮先后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沉,在得保险公司赔款120万元后,陈嘉庚便结束了航运业。

由于在经商过程中接触海运较多,加上曾经经营海运并获利颇丰,陈嘉庚对海运业了解较为透彻,他对我国海运的发展提出了不少十分细致且操作性强的建议。他在《我国行的问题》一书里,对海运的航线、船舶、舱位、膳食、药品、日用品、制服、规章、收支情况等做出了十分详细的规划。例如,他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指出,我国通南洋的航线可以按中、东、西分为3道,我国至东印度之爪哇为东线,至缅甸仰光为中线,至暹罗为西线。他仔细地分析了3条航线的途经港口、航程时间、频次、载重、客运收入、货运收入等。他不仅规划了航线、船只大小、规章制度等,甚至连一些具体的细节,如船上客位如何分配,餐桌坐几个人,餐椅用什么材质、尺寸多少,脸盆、剃刀需要多少个,需要哪些药物及如何按照剂量服用等,都做了十分细致的分析和规划。这些细致入微的规划足以体现他对国家航运业发展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

发展海运,除了轮船、人才,还需要有适宜的港口,陈嘉庚对此也有所论述。1956年3月,他所写的《厦门的将来》一文论及了我国大连、青岛、湛江、厦门四地的天然优良港口。由于对厦门比较熟悉,他着重论述了厦门的筭笪港、厦门港、胡里山三大港口。他针对三大港口的不同的地理位置及各自的洋面特点,分别对三大港口进行了针对性很强的具体规划,阐述了三大港口的不同地位和各自用途。他说:“胡里山面临广洋,风浪险恶,祇是国防要塞,不合商船停泊,自当别论。厦门港地区不大,那是渔业集散地点,铁路末端伸入到此,把渔获物转运到内地去,其余应尽量作为渔业港布置;将来渔业发达,渔船千百麇集,如鱼市场、冰厂、罐头及其他厂等必须设立,如仅限在该地建筑,尚恐不够。筭笪港海面广阔,东西长六公里,南北阔一千公尺,它的南岸即厦市区,东迤北则属郊区山地,西与内海联成一片。这一带沿岸是最适合于

建筑船坞、船厂、铁工厂和其他工厂的地区。”^[19]这些详尽细致的规划正是建立在他对海洋的了解及对海洋事业的高度关注基础上。

陈嘉庚大力提倡发展海运,而发展海运的重要目的是交通有无、拓展海利,促进我国货物的出口,为同胞谋求生机和福利。他力主将我国的物产和工艺品推销到国外特别是南洋。他举厦门为例,全年各季都有特产可运销南洋:“元月至四月海蚶(牡蛎)甚多,(带壳装寄内肉未挖出)属粗重之物。每帮数百吨至千吨,地道佳美,远胜洋产,最为侨胞嗜好,洋人且从他处用空运作生吃,其珍贵可知。五月至八月为生果盛出,如树梅、桃李、荔枝、龙眼及其他,尤以龙眼为佳而且盛,南洋任何果类,不能望其项背。九月至十二月为加腊鱼(或称鲷鱼)及其他出产之期。加腊鱼质味之美,冠绝鱼类,南洋鱼类虽多,莫可与竞。”^[20]他认为,我国的物产远销南洋,除了品种多、品质好,还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南洋各处的华侨人数众多,贩卖日用品、收买土产、经营工厂等大半掌握在华侨手上,这为中国商品开拓南洋市场提供了绝好的条件。

1949年3月17日,陈嘉庚发表题为《新中国必能兴利除弊》的演讲,提出新中国在“兴利”方面要做到6点,其中第四点和第六点为“整设水陆交通”和“开发矿产与海利”^{[2]93-94}。他认为这6项重要事业,需要耗费巨大资金及较长时间,对国家长远的发展举足轻重,需要大力推行。“若能积极实行,由小而大,由近而远,五年十年之后,当略有可观,再加二三十年,无难与欧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2]9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百业待兴、举步困难,但是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信心十足,对祖国的发展前途信心百倍,他毫无保留地为祖国的发展建言献策。

(三) 兴办水产、航海教育,培养海洋人才

陈嘉庚对祖国海洋事业的突出贡献体现在创办水产航海学校,为祖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推动了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促进国民海洋素养的提高。由于清朝政府和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近代我国海权沦丧,水产、航海事业十分落后,航海教育和航海人才培养长期缺失。在陈嘉庚创办水产航海学校之前,“偌大的

中国,就只有一所商船学校和两所水产学校”^{[16]6}。水产航海院校寥寥无几,渔业航业人才极端缺乏,这对我国挽回海权、开拓海洋十分不利。陈嘉庚认识到,要“开拓海洋,挽回海权”,就要振兴渔业、航业,“欲振兴航业,必须培育多数之航业人才”^{[3]162}。因此,为了“内利民生,外振国权”^{[16]341},陈嘉庚于1920年着手创办水产航海教育。1920年2月,陈嘉庚创办集美学校水产科;1924年,水产科改为水产部;1925年,更名为“集美学校高级水产航海部”;1927年,又更名为“福建私立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后学校几经变动,校名也几经变迁,但其教学目标始终为“造就渔业航业中坚人才,以此内利民生,外振国权”^{[16]341}。

为祖国培养水产、航海人才,陈嘉庚殚精竭虑,不惜耗费重金。为了吸引更多学生报考水产、航海科,学校规定水产、航海学生“学膳宿费均免”。不仅免除学杂费、伙食费和住宿费,学校还提供被席蚊帐和统一的制服。这为贫寒的学生创造了难得的就学条件,福建和广东沿海一带许多贫寒子弟都踊跃报考集美学校水产科。陈嘉庚的海洋教育理念先进,他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德育为首,且高度重视学生的实践操作。学校花重金先后建造了“集美第一”号、“集美第二”号、“郑和”号、“祖述”号等多艘舰艇,供学生实践操作之用,其中“集美第二”号是中国第一艘,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拖网渔船^{[3]172}。1925年,航海部师生驾驶仅有31吨的小型汽油发动机船“集美第一”号,从集美航行2000里到达上海,创造了轰动航海界的“片舟渡重洋”的壮举。即使在抗战非常时期,学校也积极创造机会让学生参与实践。《集美周刊》记载:“近日抗战关系,沿海各港口多被敌人封锁,渔业方面,不无影响。水产学科实习指导会为使学生彻底明瞭非常时期渔业起见,……往永宁、深沪、厦门一带渔村调查。闻此举不但为学生课外之实习,且可供将来政府救济渔村之参考云。”^[21]重视实践、学以致用、重视社会责任,始终是陈嘉庚水产、航海教育的特色。

陈嘉庚创办的集美航海学校,是我国最早培养航海人才的学校之一,培养了一批我国现代航海业的先驱,被誉为“航海家的摇篮”。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后,全国水产航海类学校陆续停办,内迁至三明大田继续艰苦办学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唯一没有停办的航海学校,避免了我国水产航海人才的断层。可以说,集美学校航海教育是新中国航运业的一块重要奠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嘉庚决定回国定居,以便全身心投入到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复建和扩建工作。集美学校航海教育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今,由集美航海学院、厦门水产学院等5所高等学校合并组建而成的集美大学,继续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技术支持。

除了集美学校,陈嘉庚于1921年创办并于1937年无偿捐给国家的厦门大学也重视开发和利用海洋。陈嘉庚曾给厦门大学定位:“厦门大学特别注意三点:(1)对于自然科学的设备务求充实。(2)对于海产的研究务必努力。(3)对于海防的管理务求格外注意。”^[22]1946年,厦门大学正式创建海洋系^[23],为我国第一个本科海洋系。厦门大学海洋学科被誉为我国海洋教学、科研的“蓝色摇篮”。

出于对海洋事业及海洋人才的高度重视,陈嘉庚在新加坡也积极兴办水产航海学校。1938年11月,陈嘉庚在《南洋商报》发布《新加坡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招生简章》。新加坡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以造就水产航海职业人才、开拓祖国及南洋之海利为宗旨,教授水产及航海学理与技术。遗憾的是,1942年日军攻占新加坡,新加坡华侨水产航海学校停办。

中国航运业的发展始终牵动着陈嘉庚的心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着国家海权的收回及海洋经济的发展,对渔业航业人才需求巨大,陈嘉庚及时扩大水产商船专科及高级水产航海职校的招生规模,并着重提高水产航海人才的培养质量,为新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陈嘉庚积极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建设航校,培养航海人才。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他提了7项提案,其中一个就是“在沿海各重要地区设立水产航海学校案”^[24]¹⁴³。1956年2月7日,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再次言及此事,“希望有关部门对培养此技术人才

加以注意”^[25]。可以说,从1920年开始,陈嘉庚为创办和推进祖国的水产航海教育奋斗一生。一百多年来,陈嘉庚创办的航海水产教育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中高级航海人才,广大校友成为我国航运事业的中坚力量,为我国的海洋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 关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科学

广义的海洋资源包括海洋自然资源和海洋历史文化资源。狭义的海洋资源仅仅指海洋自然资源,包括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海水资源、海洋能与海洋空间资源^[26]。我国自古以来以农业立国,统治者往往视海洋为畏途,明清两代更是长期实行海禁政策。“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导致我国海洋科学研究落后、海洋资源利用不足。陈嘉庚发现,“我国科学落后,近来对农业已有注意,设大学农林科及实验场许多处,至于海洋生物尚多未及”^[14]¹⁴⁷。他认为,我国不但应注重发展农业,也应该关注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宝库,面向海洋、注重实用、注重研究是陈嘉庚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重要理念。

1. 为海洋生物研究提供便利。因为厦门滨海,所以陈嘉庚在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初期就非常重视推动两校开展与海洋科学相关的研究。厦门大学创办初期,陈嘉庚非常舍得投入,学校的师资和设备都较为完善,在海洋生物研究和利用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早在20世纪20年代,厦门大学在国内率先开展海洋生物科学的研究。建校初期,厦门大学的文昌鱼研究就名扬四海。1923年,厦门大学美籍教授莱德在*Science*发表了论文《中国厦门大学附近的文昌鱼渔业》^[4]⁴⁸。1924年,莱德教授在厦门刘五店海域又发现了一种新品种水母,为了向陈嘉庚致敬,他将其定名为“陈嘉庚水母”^[4]⁵⁶。陈嘉庚对厦门大学在海洋生物研究方面的成果颇为自豪,他说:“北平某大学提倡派员调查,可供研究之机关,乃召数大学组织委员会,议决须有三项资格,方合为海洋生物实验所:第一,该大学或专门学校须临海;第二,该处海产须丰富;第三,须化学生物等仪器完备。……认厦门大学为最合格。”^[14]¹⁴⁷1930—1934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连续5年与厦门大学合办“暑期生物研究

会”^[4]¹³，集中了全国生物学界的精英，有力推动了中国海洋生物学研究。此外，厦门大学还集中力量开展水生生物研究与标本采集。时任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注重搜罗各种物产标本，他与国外多个大学订立协议，时常交换标本。因此，厦门大学博物院生物标本贮藏颇丰。国内大学有需要海洋生物标本时，厦大也常不吝供给。

民国时期，不论是《集美周刊》，还是《厦大周刊》和《厦门大学学报》，都成为两校师生发表海洋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例如，1931年第277期《集美周刊》为水产专号，上面集中发表了张荣昌的《厦门渔业不振之原因》、施嘉铨的《海上渔获物的保存法》、巫忠远的《中国渔业保护政策评论》、吕毓宁的《改良旧式帆船拖网渔业之商榷》等文章；1936年，金德祥在《厦门大学学报》第6期发表了《福建省海洋生物采集调查报告》一文；1941年，鄢云让在《集美周刊》第13—14期合刊发表了《略谈海洋中的细菌对于渔获丰歉之关系》一文，等等。上述成果的发表，推动了我国的海洋科学研究。

2. 利用海洋动力和空间资源。陈嘉庚深知海洋资源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海洋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并不重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嘉庚在家乡充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才成为可能。

利用海洋潮汐能发电。陈嘉庚很早就意识到海洋潮汐能是一种巨大的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嘉庚组织人力在厦门集美挖掘沟渠，建造海潮发电站。1957年年底，集美海潮发电站工程开工，陈嘉庚把发电站的名称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太古海潮发电站”。虽然后来海潮发电因为技术原因归于失败，但陈嘉庚敢为人先，重视海洋资源开发、注重技术创新的进取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修筑长堤，围海造田。围海造田是人类利用海洋空间最古老的方式之一。福建多山少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于是，围海造田就成为福建开发利用海洋的一个重要方向。在1951年10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陈嘉庚提出沿海各

省围垦海滩，以扩大耕种面积^[27]。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陈嘉庚在会上提了4项提案，其中就包括“请政府派员调查沿海袋型海滩，组织民工围滩造田”^[24]¹⁸⁰。1955年，陈嘉庚列举闽南沿海乡村利用海滩挖土筑堤的事例，有力地说明了修筑杏林海湾长堤、围海造田的可行性。上述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体现了陈嘉庚敢为人先，积极认识海洋、利用海洋的创举。

三、陈嘉庚海洋观的时代回响

早在20世纪初，陈嘉庚就深刻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他更是身体力行参与到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利用海洋的行动中，提出要挽回海权、倚海谋生，并致力于海洋人才的培养，为中国的海洋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理念和实践不仅符合那个时代的发展需求，也为今日和未来发展海洋事业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

（一）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海洋强国梦的根本保证

早在清末民初，陈嘉庚就深刻认识到海洋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他多次强调海洋的重要性，呼吁国家要重视海权、利用海洋。但由于晚清和民国政府的无能，陈嘉庚的个人努力无法扭转中国海权沦丧、被动挨打的局面，他依靠海洋来强国富民的愿望无法得到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海洋事业发展，并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海洋战略思想，我国的领海主权才得以维护，海洋权益才得以保障。从以“生存”为底线的防御性海洋政策，到以“发展”为主线的开放性海洋思想，再到新时代以“强国”为核心的外向型海洋战略^[28]，我国的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如今，我国海洋事业已发生根本性变革，取得突破性成就。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海洋资源与权益成为世界各国角逐的热点。随着国际局势的日益复杂和海洋权益争端的不断增多，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海洋事业的全面领导尤为重要。只有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海洋工作

的重大决策部署和任务安排,积极构建中国海洋治理体系,不断推进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保障国家的领海主权的完整和海洋权益的安全,促进祖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实现海洋强国梦。

（二）陈嘉庚开发利用海洋的实践有助于更全面认识和利用海洋资源

陈嘉庚非常重视海洋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早年经商时,他主张发展海运、拓展海利,充分利用海洋资源来发展国家经济。在兴办教育过程中,他积极支持海洋科学研究,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均设立了以海洋研究为导向的学科,推动了中国当时海洋科学的发展。陈嘉庚的海洋观和开发利用海洋的实践探索为现代海洋政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海洋资源丰富且海洋战略位置重要。今天,海洋经济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海洋经济在国家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2023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99 097亿元,比上年增长6%,增速比国内生产总值高0.8个百分点^[29]。在发展海洋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注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更要关注海洋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三）陈嘉庚的海洋教育观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海洋教育是陈嘉庚实践其海洋观的重要途径之一。陈嘉庚意识到,培养海洋人才是国家发展海洋事业的基础。为了推动海洋教育,他设立了集美学校水产科和航海科,培养了大批海洋科技人才和航运人才。随着全球海洋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培养高水平的海洋科学人才变得日益迫切。加强航海教育,培养具备国际航海素质的人才,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陈嘉庚兴办的海洋教育不仅教授学生海洋科学技术,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海洋意识、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他鼓励学生在学成之后投身到祖国的海洋事业中,为国家的海洋事业贡献力量。通过坚持不懈的海洋教育,陈嘉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海洋科学知识和爱国情怀的人才,为中国的海洋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陈嘉庚创办的航海教育,为我们提供了培养专业海洋人才的良好范例。现代高校和科研机构应当继承并发扬他的教

育理念,创新办学模式,提升教学科研水平,为国家的海洋事业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四）陈嘉庚经略海洋的观念与海洋强国战略不谋而合

纵观人类历史,善用海洋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既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渠道^[3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包含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中国和东南亚的交通往来在新时代不断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引发新一轮中国人“走出去”浪潮。2019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理念,是对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补充与完善,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中国的模式与经验,推动了全球海洋治理深入发展^[31]。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为维护海上公共安全,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将推动全球海洋事业发展不断开启新的篇章。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维护海洋权益成为国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海洋战略与陈嘉庚当年所提出的重视海权、拓展海利、发展航海教育、培养海洋意识的观念高度契合。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陈嘉庚的海洋思想和观念再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发展海洋事业,不仅关系到我国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效,而且关系到我国的国土安全,关乎国家兴衰安危与民族生存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32]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看到,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亟需新质生产力支撑,目前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新型复合人才培养等方面还存在短板。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深刻理解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从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力,推进海洋规划和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海洋强国建设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李剑. 新时代呼唤新的国家海洋观 [N]. 解放军报, 2017-04-25 (7).
- [2] 王增炳, 陈毅明, 林鹤龄. 陈嘉庚教育文集 [G].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9.
- [3] 洪卜仁. 厦门航运百年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 [4] 袁东星, 李炎. 启航问海: 厦门大学早期的海洋学科 (1921—1952)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21.
- [5] 宋丽丽. 陈嘉庚海权意识及其教育实践 [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23.
- [6] 陈国飏, 陈慎. 以软实力视角看福建海洋文化: 以陈嘉庚为例 [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4 (3): 60-63.
- [7] 彭化义, 陈茂宏, 鲁峰. 大海永远铭记: 追寻著名华侨陈嘉庚的海洋报国路 [J]. 航海, 1990 (2): 14-15.
- [8] 田圆. 兴学育才 逐梦深蓝: 陈嘉庚创办航海教育培养海洋人才侧记 [N]. 福建日报, 2024-05-24 (7).
- [9] 薛晗, 李成明, 赵强. 从《我国行的问题》探析陈嘉庚海洋观 [J]. 珠江水运, 2021 (3): 97-98.
- [10] 聂向明. 近代“海权”概念在中国的确立 [J]. 人文论丛, 2022 (2): 338-351.
- [11] 陈嘉庚. 陈嘉庚自述: 下册 [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 549.
- [12] 厦门市总工会, 编. 厦门工人运动史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1: 264.
- [13] 陈宏雄. 潮涌城北: 近代宁波外滩研究 [M].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8: 13.
- [14] 陈嘉庚. 陈嘉庚回忆录: 上 [M]. 济南: 泰山出版社, 2022.
- [15] 陈嘉庚. 冀早收复海权 [N]. 南洋商报, 1939-02-21 (6).
- [16] 骆怀东. 集美航海院校史 (1920—1990)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 [17] 陈碧笙, 杨国桢. 陈嘉庚传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166.
- [18] 陈嘉庚. 南侨回忆录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22: 579.
- [19] 张其华. 陈嘉庚在归来的岁月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218.
- [20] 陈嘉庚. 我国行的问题 [M]. 香港: 嘉庚风出版社, 1946: 11.
- [21] 水产高五、十四组将作非常时期渔业调查 [J]. 集美周刊, 1938, 23 (2): 5.
- [22] 陈达. 浪迹十年之行旅记闻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92.
- [23] 中国海洋年鉴编纂委员会, 中国海洋年鉴编辑部. 1987—1990 中国海洋年鉴 [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2: 225.
- [24] 周日升. 集美学校八十年校史 [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3.
- [25] 陈嘉庚. 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 [G] // 朱立文. 陈嘉庚言论新集.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20.
- [26] 吴彩斌. 环境学概论 [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4: 107.
- [27] 林斯丰. 陈嘉庚精神读本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9: 154.
- [28] 贾宇, 张小奕. 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的海洋战略思想初探 [J]. 边界与海洋研究, 2018 (3): 5-17.
- [29] 刘诗瑶. 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 [N]. 人民日报, 2024-07-12 (3).
- [30] 张峰. 中国共产党海洋观的百年发展历程与主要经验 [J]. 学术探索, 2021 (5): 10-18.
- [31] 胡志勇. 中国海洋治理研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43.
- [32]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9.

(下转第43页)

- [10] 吴何奇. 公众认同视阈下我国社区矫正问题反思 [J]. 河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8, 27 (1): 47-56.
- [11] 王平, 安文霞. 西方国家循证矫正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 [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3 (3): 5-16.
- [12] 江山河. 美国社区矫正的起源、发展、现状及对中国的启示 [J].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19 (2): 31-41.
- [13] 富阳区司法局 “3+3+X” 深化社区矫正教育帮扶模式 [EB/OL]. (2020-08-12) [2023-11-24]. http://sft.zj.gov.cn/art/2020/8/12/art_1659555_54399740.html.

The Predicament of Classified Management and Individualized Correction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and Its Solutions

YUAN Shuai¹, HUANG Chenju²

- (1. College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2.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Jimei District,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After nearly 20 years of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community correction in China: emphasizing hierarchical supervision and ignoring classified education assistance; the nature of punishment is weakened, and the regulatory deterrent is insufficient;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standards are vague and lacking in standardization, regulatory measures at different levels are little different, reward and punishment system is not perfect, and there is a lack of deterrence and incentive; the education assistance measures are collective and basic, with insufficient individuation and unsatisfactory effect. Therefor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in practice, we should pay equal attention to hierarchical supervision and classified correction, and to the attributes of punishment and social welfare; improve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deterrent and incentive role; classify crime types, and supplement it with other classification methods, so as to gradually promote the refinement of classified education; explore the educational correction methods with personalized contents and diversified forms.

Key words: community correction ; hierarchical supervision, ; classified education and correction; personalized correction

(责任编辑 冯庆福)

(上接第 26 页)

Tan Kah-Kee's Ocean View and Its Practical Exploration

WANG Yanqin¹, DONG Ligong²

- (1. School of Marxism, Chengyi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maritime status and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maritime disputes, drawing wisdom from predecessors' thinking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ocean will help advance our strategy of becoming a maritime power. Based on his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ocean, Tan Kah-Kee's formed a distinctive view on the ocean: defending maritime rights and maintaining maritime security; developing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and vigorously expanding maritime interests; establishing aviation schools to cultivate marine talents; stressing marine resources and developing marine science. He strongly called for understanding and utilizing the ocean, and personally participated in practical exploration, making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our country's marine cause.

Key words: Chen Jiageng; ocean; ocean view; maritime power

(责任编辑 冯庆福)